责编： 兰文飞 E-mail:lanwenfei@126.com Tel:010—62806237

◆书 摘

近代经典的淡出

□罗志田

近代西潮的冲击，当年就曾被一些读书人视为“学战”。不仅有时人所谓“毁学”“灭学”的直接打压，“西学”本身的确立也使传统的“道”被空间化。王国维曾简明指出：“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道”本应是适用于普天之下的，既然西方自有其“道”，则中国的“道”也就成为中西学区分下的一个区域成分了。这样空间化的结果，是“道”的一大退步或退让，最能表明时代的转换。这是王国维晚年的表述，那时他已明确站在中学一边，却也逃不出中西对峙的立场，甚至并未意识到自己其实已远离过去读书人的立场了。

近代的“经典淡出”，大体可区分为无意识的推动和有意识的努力。前者以张之洞在清季提倡的“以简化方式保存传统”这一取向为代表。后者则大体表现为两个阶段：一是从清季已开始的使经典“去神圣化”；二是民初特别明显的整体“去经典化”。从大环境看，近代日趋激烈的中西文化竞争也有力地支持了趋新读书人“去经典化”的努力。此事牵涉甚宽，我会专文讨论，这里不能详细讲，仅大体勾勒一个简单的线条。

先说无意识的推动。经和经学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张之洞的目标当然是要维护传统，但其提出的主张又隐伏着对此核心的致命威胁。他曾引用《老子》中的“损之又损”来概括这一取向，主张仅读《近思录》等四本综合性的参考书，便已可基本掌握“中学”，而将其余精力皆用于西学。沿此路径走下去，经学在中国思想言说中退居二线是迟早的事，全不必新文化运动来激烈反传统。这与章太炎等提倡“复古”者却从根本上荡击了儒学，真有异曲同工之效。

再说有意识的努力。近代经的地位可见一个从圣贤书（Scriptures）降为纯世俗意义的一般经典（the Classics）的进程，可称为“去神圣化”。这是一个有意促成的转变，曾为晚清改革重要推手的黄遵宪，对清季全国“兴学校”的风潮甚为不满，颇感其举措“皆与吾意相左”。其中一个重要的差异，即“吾以为‘五经’‘四书’，当择其切于日用、近于时务者分类编辑，为小学、中学书，其他训诂名物归入专门，听人自为之；而彼辈反以‘四书’‘五经’为重”。

这一表述异常重要，说明黄遵宪等人已将经典的“去神圣化”落实到意识层面。改编“四书”“五经”的前提竟然是不“以‘四书’‘五经’为重”，其“去经典化”的意旨可谓昭然若揭：就是要把经书从“圣贤书”的经典地位中解放出来，使之或“切于日用”，或“归入专门”。而这里的“切于日用”是与“近于时务”相并列的，显然偏重于实用一面，即使存留一些规范人伦的意思在，也已不再具有不可更改的神圣性；而一般经典意义的经书在专门化以后，更不复具有对社会人生的整体指导意义了。

有意“去神圣化”的结果到民初已经很显著，胡适后来回忆说：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很明显，胡适是把“四书五经”作为“学术思想”的对比参照物。这很有提示意义。梁启超著作影响胡适之时还在晚清，而他写回忆时约在民国二十年，在此过渡时代，“四书五经”本身也经历着过渡——从曾经规范人伦的道义载体变为过去“学术思想”的载体，以及当时“学术思想”的研究对象。这已是一个充满颠覆意味的转变了。

而民初更明显的是趋新读书人那整体“去经典化”的努力，任何读经的提议或举动都遭到强烈反对，迄今亦然。有意思的是，这些反对读经者似乎遗传了晚清读书人那种缺乏自信的心态，他们在意识层面连经书的一般经典地位都不承认，在下意识层面又仍把经视为圣贤书，颇高看之，故对其可能的威胁或威慑力始终警惕。

问题是，假如“经”一被读就有无数危害，则这些人平时所提倡读的那些新文籍何以没有这样大的影响力？若有，就不必怕读经；若没有，就要检讨其是否提倡有误。其实“经”在现代绝无那样大的力量，这方面的威胁更多是想象的。但这持续的警惕和防备很有影响力，其效果就是整体的“去经典化”，现在恐怕连有能力在大学教经学的人都少之又少了。

重要的是，任何社会的“经典”本来都不仅局限在象牙塔里，也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存在于百姓的人生日用之中（与黄遵宪心目中的“切于日用”有同有异）。传统经典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影响极为深远；尽管其表现可能是逐步的，一开始未必那么直接和明显。近代经典淡出之后，社会处于一种无所指引的状态，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此不赘述。

经典退隐之后最直接的变化是，“学问”本身的内涵与外延，以及怎样治学，都成为需要思考和梳理的问题。甚至“读书”这一带有象征性的行为，也开始具有不同的意义。伴随着科举制的废除，不论在社会还是思想层面，以及新兴的学科体制层面，与“读书”行为相关的一系列范畴，都面临着重新规整的需要。读书人的自定位和社会定位，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并带来许多困惑。

摘自《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1 月

◆治学视野

莫把汉学当国学

□慕朵生

日前，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携带《曹寅与康熙》等新书来华举办首发式，并在多所高校进行讲座，所到处既有诸多学者为其站台，更有大批学生前来听讲，在学界和媒体引发新一轮“汉学热”。但笔者以为，“汉学”当热，然不可将之混同为“国学”。

汉学（Sinology）是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学者研究和介绍中华文化的学问，历经游记性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派汉学，以及侧重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学”（China Studies）等几大阶段，至今已有 600 多年历史。面对中国浩瀚的文化和复杂的现实，汉学家们皓首穷经，著书立说，既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也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甚至改写了世界的文明进程。比如，欧洲“启蒙运动”就深受来华传教士介绍的儒学的启迪，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夕阅读的则是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

不过，中国学界对汉学的追踪和介绍仅有 100 多年的历史，且忽冷忽热，不成系统。其中，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国内曾分别兴起一股“汉学热”，原因是这两个时段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思想争鸣活跃，国人迫切希望通过汉学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此次史景迁访华引发的新一轮“汉学热”，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时代背景下，国人试图借助汉学对自己国家崛起和文化复兴进行的一种心理上的印证和调适。

不难看出，汉学不仅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还是中华文化反观自身的镜子。通过汉学，中华文化既能发现自己的优缺点、长短处，也能了解自己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方位和价值。因此，中国有必要资助各国汉学研究，尤其是应系统地对汉学进行历史梳理，动态跟踪，翻译名著，甚至可以像编纂《儒藏》《道藏》一样集成大部头的《汉藏》，借以进一步促进中华文化的自我省察和海外传播。

然而，汉学虽有重要价值，但亦不可无限拔高。迄今为止，在中国尚未有一本人人必读的汉学著作或一位家喻户晓的汉学大家——就像中国学界虽然研究西方哲学百余年，但从未产生过一位研究西方哲学而在欧美国家享有卓越声誉的哲学家一样。因为，汉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西学”，是西方人用西方价值观念、学术范式来研究中华文化的学问。对汉学家而言，中华文化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就像实验室的试验品或博物馆的展览品一样，很难内在于自己的生命，灌注以自己的情感，更很少负有弘扬和光大的责任感。

但是，中国人注定做不了中华文化的旁观者。因为，千百年来积累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亦即通常所说的国学，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正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者，须对国学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否则，遗失国学就等于抛弃了传统，丢掉了根本，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会得历史失忆症和精神分裂症。

令人遗憾的是，百余年来中国人一度迷失国学，崇拜西学，形成了一种与“西学心态”互为表里的“汉学心态”——前者指试图以西学取代国学，后者指像汉学家一样把国学仅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不再用生命和情感去体验并证成国学的优美价值。尤其是近些年，中国学界还出现了以获得外国汉学奖项为荣，以邀到一两个汉学家参加学术会议为耀，甚至是“国学家”和“汉学家”互为“代销商”，彼此吹捧，共谋学术名望乃至经济利益的灰色学术现象。

上述现象的实质是国学的“汉学化”，如任其发展下去，国学将会变成一种“在中国的汉学”，而汉学乃至西学则会变成“在中国的国学”。中医的可悲结局就是前车之鉴。中医本是“国医”，自有其独特的理论和方法，但几十年来却拼命用西医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结果适得其反，屡屡被西医宣布为“伪医学”。

总之，汉学当热，但不能将之混同为国学，更不能以之取代国学。今年是以 1814 年法国法兰西学院设立汉学讲席为开端的“学院派汉学”诞生 200 周年，我衷心祝愿汉学能早日成为国际显学，更希望中国能大踏步复兴自己的国学，同时热烈欢迎海外汉学回家，使自己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正如民国时期史学大家陈垣先生所说：“现在中外学者谈论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到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

◆好书推荐



书名：《亲历拨乱反正》
作者：沈宝祥
出版：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4 年 1 月



书名：《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报告（2013）No.3：简政放权与转变职能》
主编：魏礼群
出版：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4 年 3 月

作者谈书：我写的这本书，主要是记载我所经历、所见证的一些事，以及我进行调查访问得到的材料。我是将这两本书（之前已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编者注）当作历史著作对待的。我定的方针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本书的依据是，我经历的事，我的日记，笔记，我保存的资料，我查阅的资料，访问当事人所得的资料。书中有些日期，有些史实，经过多次查对，力求准确。从主观上来说，尽量做到言之有据，避免或减少人们的考证，以对得起当代人，对得起后代人，对得起历史。但我要老实说，这本书也有局限性，有的地方是含糊其词，有的事没有写。

编者谈书：本书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推出的第三本蓝皮书。本书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为指导，围绕 2013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与转变政府职能这个中心，以转变政府职能为主题，从不同层面对此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和论证。本书资料翔实，分析有据，展示了 2013 年中国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状况，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前瞻性。

◆书而思

左宗棠家书中的节俭家风

□刘绍义

喜欢读清人的日记，也喜欢读清人的家书。清人日记喜欢翁同龢和恽毓鼎的日记，至于家书，我最喜欢的，就是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家书了。特别是左宗棠，置身军旅，驰驱戎马，还不忘远方课子，家书不断，难能可贵矣。

昨读吴庆坻《蕉廊脞录》，又见其收录的左宗棠家书数则，其中的“富贵怕见开花”，印象最深，颇有感慨。这句看似平常的俗语，其实蕴藏着很深的道理。花开即见花谢，告诉家人不要贪恋富贵，要知道放手，懂得节制。富贵时要想到寥落，花开时要想到花谢。

正是因为此，这个受到林则徐、胡林翼、曾国藩、潘祖荫、裴景福以及光绪皇帝等人极高赞誉的封疆大吏，面对每年两万两白银的俸禄，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女，而是自己那些需要接济的部下或同僚。他的部下刘典去世，他一次性给其家属六千两银子，这与他每年给自己家中的二百两银子比起来，整整是 30 倍之别。这也正是这位父亲的伟大之处，因为子女能够自食其力，别说是六千两银子，就是六万两金子，也难以买到的品质。

“吾积世寒素，近乃称巨室，虽屡申儆不可沾染世宦积习，而家用日增，已有不能撙节之势。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尔辈宜早自为谋……恪遵功令，勿涉浮嚣，庶免耻辱。”简约为荣，铺张可耻，浪费绝对不是左家的品格，你们自食其力，才是生存的正道。

左宗棠的周夫人去世时，他嘱咐儿女们要勤俭处理丧事：“理所当用，稍多无碍；所不当用，即一文亦不可用。”同治九年七月，他写信给孝威、孝宽两个儿子：“吾意不欲买田宅为子孙计，可辞之。吾自少至壮，见亲友做官回乡便有富贵气，致子孙无甚长进，心不谓然，此非所以爱子孙也……明春拟筹备万两为吾湘阴赈荒之用，故不能私置田产耳。”孝宽将家中旧屋改造，他写信痛骂：“贫寒家儿忽染脑满肠肥习气，令人笑骂，惹我恼恨。”

左宗棠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都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他告诉儿子：“自入军以来，非宴客不用海菜，穷冬犹衣缊袍，冀与士卒同此苦趣，亦念享受不可丰，恐先世所贻余福至吾身而折尽耳。古人训子弟以‘嚼得菜根，百事可作’，若吾家则更宜有进于此者，菜根视糠屑则已为可口矣。尔曹念之，忍效纨绔所为乎？”他 60 生日来临之际，还特意叮嘱儿女们：“今年满甲之日，不准宴客开筵，亲好中有来嘱者照常款以酒面。不准下帖，至要，至要。”“古人教子必有义方，以鄙吝为务者仅足供子孙浪费而已。吾之不以廉奉多寄尔曹者，未为无见。尔曹能谨慎持家，不至困恶。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恣情流荡，以沉溺为欢娱，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

对于子女与朋友的结交，左宗棠也非常重视。当他听说家里有人与纨绔子弟结交时，急忙去信责之：“至子弟好交结淫朋逸友，今日戏场，明日酒馆，甚至嫖赌、鸦片无事不为，是为下流种子。”左宗棠把嫖赌、吸毒的纨绔子弟视为下流之人，对他们深恶痛绝，所以警告儿子万不可与之交往。就是对自己的侄子，左宗棠也是一点也不敢放松，提出了与儿子一样的要求：“侄移居省城，迥不若从前乡居僻静，切宜从严约束，勿令与市井为伍，致惹闲事学坏样，是为至要。”

左宗棠教子严格，深受大家赞许，当时就有人称赞说：“公（指左宗棠）立身不苟，家教甚严。入门虽三尺之童，见客均彬彬有礼。虽盛暑，男女无袒裼者。烟赌诸具，不使入门，虽两世官致通显，又值风俗竞尚繁华，谨守荆布之素，从未沾染习气。”对一个家庭来说，还有什么东西比这些赞誉更珍贵呢？

◆书海泛舟

读书人的“书店情结”

□孙曙峦



张定价 15 元的手绘《北京书店地图》，详细标注了北京各类书店、阅读机构等 95 家，上市两个月竟然卖出一万张。

“两个月卖出一万张”无疑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业绩，那么，这样的业绩从何而来呢？

没错，这张地图集趣味性与实用性于一身，确实能够吸引一些人的目光。但在笔者看来，手绘书店地图之所以能够走红，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击中了读书人的“书店情结”。

是的，在每一个读书人的心里，都有一个一往情深的“书店情结”。读书人热爱书店，即使不买书，也喜欢往书店里去。

推开书店的大门，当舒缓轻柔的背景音乐在耳边响起时，读书人的一颗心，一颗在尘世里急躁焦虑的心，便神奇地安定下来。沿着书架，读书人慢慢穿行，不时拿起一本书翻翻；也许这一翻，就让读书人的眼睛再也无法从书页上移开；那好吧，干脆找个角落坐下来，将整本书看个痛快。也许翻来翻去，读书人始终未找到那本让自己眼睛一亮的书；那也没关系，这样的随意翻阅，对读书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就算一本书也不碰，单单在书店里走走看看，读书人也会感到心满意足，因为浓郁的书香总能让人心生慰藉……待到走出书店时，哪怕两手空空，读书人的内心也是饱满而充实的。对读书人来说，书店就是心灵的绿洲；这方绿洲，养眼，更养心。

读书人迷恋书店，希望书店能够长命百岁地开下去。但不幸的是，时代的快速发展，让书店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这几年来，广州三联书店，上海思考乐书局、席殊书屋以及北京光合作用书店、风入松书店等纷纷缩减门店或倒闭。每每听到这样的消息，读书人都会长叹一声，无奈而又痛惜。

也许有人会说，叹息什么，都是读书人不去书店买书，才让书店接连倒闭的。这话，真是对读书人的冤枉。诚然，因为方便、快捷而便宜，不少人选择了网购，但真正令实体书店无法生存的，却是昂贵的房租与各种各样的税收。先说房租，“纸老虎”曾在中关村家乐福超市开了一家面积四五十平方米的小书店，最初房租是每天每平方米 1.5 元，后来一路涨至一二十元。“每月要交 3 万元房租，那么大一点儿的小书店，每月怎么可能卖出 3 万元的书呢？就算把销售额全给超市也不够，只能关门。”再说税收。据了解，书店涉及的税种共有 8 种，分别是增值税、城建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所得税等。如此多如牛毛的税收，岂是书店能够招架得了的？

为了支持自己心爱的书店，许多读书人哪怕网上的书籍再便宜，也会选择去实体书店购买。但可悲的是，相对于书店的沉重负担，读书人的支持只是杯水车薪。最终，读书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书店一家家倒闭。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在心里祈祷，祈祷其他的书店能够坚持下去。

因此，当手绘《北京书店地图》问世后，读书人的欣喜可想而知：太好了，北京还有这么多的书店。把地图买下来吧，然后一家家找过去。若没有读书人的“书店情结”，手绘书店地图就算做得再精致再可爱，也不会赢得多少人的青睐。

读书人的“书店情结”，正是实体书店得以生存的土壤，更是宝贵的社会阅读资源。对于这一情结，政府应当善加珍惜，珍惜的方式，就是善待书店扶持书店，让书店能够如大树一般，在城市深深地扎下根来，成为所有人的心灵绿洲。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 年第 4 期要目

决策要闻
习近平：以强军目标审视改革、引领改革、推进改革

本刊策划
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经济持续升级（共 6 篇） 余 斌等

理论视点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时而制”——再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8·19”讲话精神 李燕奇
习近平现代治理思想是全面改革开放主引擎 许正中

改革纵横
社会治理的政府之维：现状、挑战与转型 张林江

治党论苑
组织部长谈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下）（共 3 篇） 张 革等

地方探索
双向监督权力 推进治理创新——四川省彭州市探索“民心通”工程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民心通”调研组

观往知来
压力型决策典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 沈传亮